

• 科学技术史 •

济南麻风疗养院医疗、科研与培训之研究

A Study on Tsinan Leper Hospital and Its Medicine, Research and Training

叶大深 /YE Dashen 刘家峰 /LIU Jiafeng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摘要: 济南麻风疗养院成立于1926年, 是民国时期唯一一所集医疗、科研、教育培训为一体的麻风病救治机构, 知名传教医生海贝殖、司美礼先后担任院长。该院依托于齐鲁大学医学院, 经多年实践形成了一套科学完备的医疗体系, 在诊治手段及实验中西方各类药品方面始终处于全国前列, 对中国近现代的麻风防治事业起到关键引领作用, 其培养出的尤家骏等优秀医学家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麻风防治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关键词: 济南麻风疗养院 齐鲁大学 海贝殖 司美礼 尤家骏

Abstract: Tsinan Leper Hospital was the only institution that integrated medicine, researc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leprosy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Hospital was set up in 1926, and LeRoy F. Heimburger and H. J. Smyly successively served as its directors. It relied on the School of Medicine of Cheeloo University and formed a set of complete treatment system after years of practice. The Hospital had always been at the forefront in China in terms of treatment and the experiments of various Chinese and Western drugs; it played a key leading role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leprosy in modern China. You Jiajun and other outstanding medical scientists who were trained by the Hospital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lepros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Tsinan Leper Hospital; Cheeloo University; LeRoy F. Heimburger; H. J. Smyly; You Jiajun

中图分类号: R275.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5994/j.1000-0763.2023.02.009

麻风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慢性传染性疾病, 在中国古代常被视为不治之症。20世纪以降, 随着细菌理论不断发展, 医药技术日益进步, 尤其是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的持续扩张, 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兴起, 均极大影响了近代中国的麻风防治, 使之逐渐步入新的历

史阶段。近些年学界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医疗史等不同视角对此做了大量研究, 涌现出不少优秀成果。^{[1]-[9]}但从研究对象的区域来看, 论著多集中于广东、福建、江浙、云南等麻风多发的南方地区, 对华北地区关注不足。实际上麻风病例在华北绝非少数, 山东省就曾

基金项目: 山东省本科教学改革重点项目“全球史与跨国史课程群建设”(项目编号: Z2021173)。

收稿日期: 2022年3月9日

作者简介: 叶大深(1992-)男, 山东泰安人,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医疗社会史。Email: 358997371@qq.com

刘家峰(1970-)男, 山东日照人,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基督教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Email: jfliu@sdu.edu.cn

是麻风大省，本文聚焦于济南麻风疗养院。

民国时期，中国的麻风救治事业多由在华传教士及教会主导，^[10]在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特点，如福建因缺少专业医师，对麻风患者往往“只收不治”；^[5]，^[11]云南则采取强制性的隔离与治疗；^[9]杭州与广东的麻风医院设施更加完善，亦尝试将国际前沿的医疗方案应用于临床，但似乎缺乏对治疗手段的再研究与本土化。^[4]，^[12]相比而言，济南麻风疗养院依托齐鲁大学，不仅是中国治疗水平最高、方法最先进的麻风专科医院，而且集研究与教育为一体，乃同时代其他在华麻风机构所不具备的，然而该院的标杆性、引领性意义尚未被学界完全认识到。本文拟利用齐鲁大学档案、期刊材料，厘清济南麻风疗养院的历史，展现并解释传教士医生如何将国际视野融入中国本土社会，从而令这所专科医院成为一家十分成功且有别于其他机构的麻风病院。

一、济南麻风疗养院的筹建与运转

济南麻风疗养院的创立和发展离不开齐鲁大学，而对后者的论述又必须提及美国北长老会。1890年该会医学传教士聂会东（James B. Neal）来到济南，为日后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创始奠定了基础。^[13]聂氏于1898年编译出版的中文教材《皮肤证治》称麻风“乃身内极剧能伤命之旧症”，并坦言此病尚无法根治，只能“补病者之身体而已，居清爽之处，日日洗涤。”虽有说法表示使用“汞绿毒药”“大枫子油”可缓解症状，但终究无法根除。^[14]尽管华北地区的民众早已意识到麻风的传染性，不过因其杀伤力远不及瘟疫，故麻风患者来去自由，长期与健康人共同生活，^[15]这也是中国南北方应对麻风病的一大区别。^[1]

随着近代细菌理论的发展，西方人对包括麻风在内的诸多传染病的理解发生深刻变化，以隔离方式杜绝感染的观念不仅根植于欧美社会之中，也由传教士带入华北。至20世纪10年代，无论是来华传教医师还是中国本土社会，均对建立麻风隔离院愈加重视。1918年美国北

长老会于滕县创办了近代山东第一所麻风病院。同一时期，齐鲁大学也谋划在济南设立一所麻风医院。齐大医学院附属医院于1915年完成扩建后，每日都会有大量患者来访，其中不乏麻风病人。从卫生安全的角度考虑，齐大认为应设专门机构加以收治。

1921年春，齐鲁大学与万国麻风救济会取得联络，救济会同意为齐大建立麻风病院争取资金，后者则在学校附近寻觅合适的土地建院，以便本校教师、医生的指导，使麻风医院成为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实习单位。^[16]1924年，齐鲁大学校友、时任山东基督教会自立会干事的王元德为母校筹得2500银元，齐大用这笔款项在千佛山西侧买下一块约16亩的土地，^[17]同年万国麻风救济会拨款20000银元用于医院修筑和设备添置。1926年6月，麻风医院的建筑群正式完工启用，医院英文定名为Tsinan Leper Hospital，中文名称是“济南麻风疗养院”。起初由一个委员会管理，成员包括万国麻风救济会、齐鲁大学、山东省政府官员三方代表，但1927年春，救济会因中国局势动荡，决定将驻院代表撤走；次年山东政权更迭，自此麻风医院由齐大单独负责管理。^[16]

济南麻风疗养院首位院长是海贝殖（LeRoy F. Heimbarger），1889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1912年他毕业于圣路易斯大学医学院，次年被美国北长老会差派到山东潍县（今潍坊）开展医疗传教工作。1921年，海贝殖回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进修，次年重返中国，转往省城济南，被任命为齐鲁大学医学院皮肤与梅毒病学副教授；同年9月，医院皮肤花柳科开诊，他兼任该科门诊医师。1926年麻风病院建成后，海贝殖任院长。

医院建筑群根据不同需要划分成三大功能区，最南侧的一排是疗养院管理人员的厨房、办公室和卧室，此外还包括门房、燃料间、消毒室、访客接待室、储藏室及普通员工的活动区域；医生办公室位于一二排之间。第二排便是治疗区，由候诊室、实验室、门诊、治疗室和消毒室组成，二三排之间是病人的厨房、餐厅、浴室、洗衣房、织布室以及礼拜堂。第三排，

亦是最北侧的一排,设四间病房,其中两间可各容纳16名病人,另外两间可各容纳9名病人。所有建筑的外墙与屋顶均是红色,体现中式风格。建筑群实际只占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四周竖立围栏,内中的空地用以种植花卉灌木和果树,围栏之外则用来耕种小麦、大豆及一些瓜类植物,由麻风病人自主经营,收获的果实或患者食用,或运往市场售卖。入院患者需首先进行洗浴,之后由医院供给床铺被褥、衣物、浴巾、洗漱用品、水杯、餐具、病号服等,病人必须保证这些物品的洁净卫生,院方亦会每日检查。^[16]从中不难看出,医院整体设计相当科学,并以病人为中心,考虑周全,确保院内生活环境的安全卫生,建筑的风格、瓜果花木的种植也尽力营造“家”的感觉,令患者保持积极的情绪。

济南麻风疗养院至多同时收治50名住院患者,这与其资金来源密切相关。疗养院成立之初,除万国麻风救济会的拨款外,山东省政府亦承诺每月提供475银元的资助,然而由于政权更迭,该款项很快便不了了之,医院的运作只能依靠救济会每年180英镑的捐助,^[18]这就导致其最多可以为42名病人提供免费的住院医疗服务,剩余的入院患者需每月缴纳10元(此数字对民国时期普通民众而言已属高价)。尽管中华麻风救济会对疗养院也有所援助,如1927年底前者捐赠给医院“洋五十元”,^[19]1930年12月与1931年12月各捐“一百元”,^{[20],[21]}1934年圣诞节又捐“五十元”,^[22]但始终杯水车薪,被海贝殖称作“零星的资助”。^[16]因而,为保障机构的慈善属性和有效运转,疗养院长期维持在较小规模。海氏更是直言:“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超过容纳50名病人的最初规划。财务、建筑面积、人员短缺等问题促使疗养院更注重质量而非追求数量。”^[16]据一份1932年的统计,自1926年济南麻风疗养院启用开始,6年间共有169名患者先后入院治疗,其中117人最终出院,2人在院内去世,患者平均住院时长11个月,医院每月用于一位病人身上的花费约15.5银元。^[16]确如海所言,院方的着力点乃是医疗服务的质量。

二、治疗与研究并重:海贝殖治院时期

济南麻风疗养院的医疗质量主要体现于科学而系统的施治手段。事实上,早在中国宋元时期就有记载称从大风子树果实榨取的油汁可以医治麻风病,但因药性问题,大风子油在医疗实践中的应用极其有限,^[3]麻风不可治的观点仍根植于人们的观念之中。至1908年,德国拜耳公司成功将大风子油提纯,此药从口服改为注射,加速吸收的同时减少了患者胃肠道的不良反应。新方法在墨西哥取得显著效果,并开始向世界各地普及。

济南麻风病院自创建之初便将大风子油注射应用于日常实践中,不过海贝殖很快就察觉出问题,他在一篇学术论文中表示,自己注意到了菲律宾医治麻风的最新手段,即为患者肌肉注射碘化大风子油乙酯的同时,再于其病灶处注射相同药剂,但前来济南麻风疗养院的病人病灶多为萎缩性斑块,不宜采用此法,^[23]且纯大风子油乙酯极易引起被注射者的周身发热,^[16]故而海氏等人不断探索更适合当地患者的治疗方案。

海贝殖共设计了四组对照实验:一是将4%的二次蒸馏木馏油和入大风子油进行注射;二是金制剂与大风子油的混合静脉注射;三是红汞与大风子油的混合静脉注射;四是服用中药。这里需要说明,现留存的由海氏亲自书写的文献,无论档案或公开发表的文章,均未提到中药治疗麻风病的效果究竟如何,据1929年造访济南的中华麻风救济会总干事郭志坚描述,疗养院中的一名年轻女性患者“自告奋勇”尝试“一种完全根据《麻疯季刊》二卷四期所载的中药”,结果是曾经“面容如狮,狞恶不堪”的病人在服药后“节结都消减了”。郭由此表示:“世人多非议中药之不合科学,而竟有如此奇效,倘科学家能加以研究,其效力将益著。”他还夸赞海贝殖“能以科学的精神,去实地试验,殊堪钦佩。”^[24]这则消息被《申报》《新闻报》《女铎》《科学月刊》争相报道,但关键信息却做了改动。因上述几份报纸文稿内容几近

相同，这里仅引《申报》所载，其称海贝殖按照《麻疯季刊》提供的药方实验，“结果之佳，实出人意料之外。海贝殖博士谓，西人常非议中药之配置粗杂，不合科学，孰知其效力堪与西药相颉颃，试验愈久，成绩将更形显著。”^[25]可以看出，《申报》将邬志坚的话嫁接到海贝殖身上，并将“世人多非议中药”改为“西人”，结合20世纪20年代社会上弥漫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样的张冠李戴似乎无法排除有意为之的可能性，以此构建出曾傲慢自大的欧美人如今亦拜服于中国本土医药的形象。

1932年10月海贝殖出席于上海召开的全国麻风大会，其大会发言仅谈到木馏油及金制剂分别混合大风子油注射的治疗效果，只字未提当初对照试验中的后两组。^[26]在一份齐鲁大学的档案里，海氏明确表示，由于自己阅读了一篇质疑红汞药性的学术文章，第三组方案遂被搁置。^[16]至于第四组所谓“《麻疯季刊》第二卷四期”之药方，其核心仍为大风子油，再辅以川连、防风、木瓜等中药材，^[27]此药系口服，其疗效未见海贝殖有专门记录，故笔者推测，济南麻风疗养院应是以注射不同种类的大风子油为主要治疗方式，不过亦允许患者自主选择是否服用中药作为辅助手段，但后者不属于必须的医疗方案，因而才有所谓“自告奋勇愿意尝试这味中药”的记述。海贝殖1932年的大会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人们采用各种方式令这些药物（指各类大风子油）触及麻风组织。口服时，或使用胶囊，或和入其他药材；皮内注射和皮下注射时……”^[26]此处的“和入其他药材”也许包含一些中草药。

海氏真正着重推荐的是金制剂与大风子油的混合注射法，他声称接受这种治疗手段的患者康复出院比率达64.8%，且住院时长明显缩短，只需不到8个月。^[26]此方法充分体现海贝殖领衔的济南麻风疗养院在治疗领域的国际视野。20世纪20年代后期，金制剂才以注射剂的形式出现于临床实践中，多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其原理是它的消炎作用。海氏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将之大胆融入麻风病的医疗中，取得“备受鼓舞”的成效。同时，他非常坦诚

地提到这一疗法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成本昂贵，^[26]二是样本局限于山东民众，对其他地域患者的效果如何尚不得而知。^[23]从中不难看出海氏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

除金制剂外，木馏油混合大风子油的注射也是济南麻风疗养院的主要治疗手段。此方案借鉴自印度，不过海贝殖把每次注射的剂量由4-10毫升下调至1-8毫升，只有相对强健的病人才会被射入10毫升药剂。由于注射可能引发肿块，海氏将注射次数由一周两次改为一次，注射部位不做严格限制，在大腿、上臂、臀部等处轮流注射。对同样来自印度的碘化钾注射，海氏有些不以为然，他表示该法易给患者带来消化道反应、食欲不振、神经炎、发热等问题。^{[23], [28]}可见海贝殖并不盲从海外的“前沿技术”，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加以调整。

在疗养院的门诊工作中，海氏详细记录下患者的性别、年龄、职业、患病时长、病变种类等信息，以期对麻风病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16]此外他撰写多篇文章，强调药物治疗并非唯一的手段，饮食、锻炼、精神等方面亦不容忽视，比如应尽可能向患者提供足量的维生素，鼓励他们经常劳动、运动。海贝殖将病人分成若干组，每组设一名组长，各组轮流进行纺织、种植等工作。医院还引入篮球、排球等西方球类比赛，也开展武术、举重等中国传统运动。海氏认为营造快乐的医院环境，让患者获得心理的愉悦，给予他们康复的希望，都是医治麻风病的关键要素。^{[23], [26]}这些足以证明济南麻风医院有着一整套全面系统的科学医疗方案。

三、迎难而上：司美礼的改变与蓝图

1934年3月，海贝殖辞职返回美国，麻风病院院长一职被交由司美礼(H. J. Smyly)医生。^[29]司氏1882年10月7日生于都柏林，1912年获爱尔兰皇家外科医学院医学学位，次年被伦敦会派往中国；他起先供职于北京协和医学堂，后改属英国圣公会，1928年转至齐鲁大学工作，任内科主任。司美礼原主攻胃肠道疾病，并不

擅长麻风病的治疗,但成为疗养院院长后,他心甘情愿挤出时间钻研,很快便成为这方面的专家。^[30]当时的麻风患者几乎全部患有肠道寄生虫病,^[23]司美礼治疗胃肠道疾病的专长恰好可以发挥作用。在其治院期间,他将原有的各项活动充分延伸,如花卉种植本是病人住院生活的调剂,司美礼上任后开始在疗养院举办菊花展,每年的展览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参观、选购,这不仅有益于患者的心理健康,又能帮助他们赚取些许利润;司氏还鼓励病人扩大纺织生产,向大学医院输送绷带棉,以及另辟土地畜养鸡、羊等动物,借羊奶、鸡蛋为患者提供优质蛋白。^[31]

在施治手段上,司美礼亦做出调整。或许是受限成本,他放弃了金制剂与大风子油的混合注射,改用风靡一时的碘化大风子油乙酯。针对先前海氏提出的当地患者皮肤状况难以注射该药的情况,司起初似乎不以为意,坚持皮内注射的方式,但几个月后他发现50%的药剂会在拔针时泄露,这促使其转而尝试皮下注射。为防止此方法可能带来的药物周身扩散,司氏采用连续线性注射法,将10毫升的注射液插在麻风结节附近,一边退针一边把药缓慢而稳定地注射到结节的深层表面。这一套操作应颇有成效,司美礼将之作为医疗经验在第二届山东麻风大会上宣讲。^[32]

至于注射碘化大风子油乙酯带来的发热及神经反应问题,司氏对症下药,如为急性发热反应的病人进行酒石酸锑钠的静脉注射,辅以鱼肝油和钙元素的摄入,遇较严重的情况还会使用磺胺;面对神经剧烈疼痛特别是尺神经急性触痛的患者,医护人员则在其尺神经上包裹大量棉絮,以尽可能缓冲触碰带来的疼痛感,同时为神经保暖;当出现长期连续神经炎病例时,司美礼试用了白喉类毒素,并取得不俗效果。^[32]

司美礼管理下的病房更多地向中晚期麻风病人开放,这又是其与海贝殖的一大不同,此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疗养院的康复数据。司氏如此解释:“我们尽可能选择早期的轻症患者……但想坚守这一原则绝非易事。大多数申

请入院的病人都不属于此类,当中的许多人是最可怜的,很难拒绝他们的请求。”^[32]也许正是此种境遇促使司美礼于第一届山东省麻风大会上积极倡立一所大型麻风病院(详后)。而在日常的医疗活动中,司氏努力教授住院病人注射的方法,令那些麻风杆菌转阴的患者及早出院回家,一方面他们通过自行注射巩固治疗效果,另一方面可避免院内的重复感染,同时为更多病人腾出床位。^[32]

抗战开始后,济南麻风疗养院与齐鲁大学境况相似,虽然也受到人员、经费短缺的影响,但借助英美势力庇护,仍能照常运营。1940年5月10日,第一届山东省麻风大会在齐大医学院召开,到会者仅25人,但邬志坚亲赴沦陷区参会,以示对此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作为东道主的司美礼被选为大会主席。关于麻风救治的举措,会上出现两派观点:一派以驻潍县的美北长老会传教医师梅仁德(E. E. Murray)为代表,提议建立一所可容纳2000-4000人的医院,以集中收治全省的麻风病人;另一派以驻泰安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罗碧懿(Lilian G. Roberts)、国人邬志坚为代表,主张应在乡村多设一般规模的麻风诊疗所。与会者普遍赞同后者的构想,但身为大会主席的司美礼力排众议,表示“充分之研究工作决非于诊所中所能办到的”,所以建造大型的麻风病院非常必要。^[33]鉴于此,大会最终同意筹建一家可容纳4000人的麻风院。^[34]司美礼的发言也显示出其较之前任海贝殖有着更宏伟的计划,只是这所千人麻风院似乎从未真正进入过实施阶段。

首届大会宣布成立中华麻疯救济会山东分会,但受国内国际局势的影响,至当年年底,竟连协会的成员都无法敲定,^[35]直到1941年5月第二届山东省麻风大会召开前不久,组织架构才勉强搭建完毕,由司美礼出任会长。^[36]次届大会后,山东分会宣布开启募捐运动,以为将来的活动筹措资金。^[37]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侵占齐鲁大学及医院,1942年司美礼被遣返回国,他先前的蓝图就此破产。济南麻风病院则于1941年12月27日宣布解散。不过仅一个月后,日伪政府命红十字会主任孙

宪慈为院长重办医院，经费由山东赈委会供给，住院患者缩减至不足30人。^[38]物质条件亦大幅下降，据称赈委会分发的粮食“味霉多砂，食之常肚痛如绞”。^[39]医院的饮食尚且如此，治疗就更加无从谈起了。

抗战胜利后，齐鲁大学重新接管疗养院。1948年2月，年近66岁的司美礼从英国回到山东，继续出任麻风病院院长。^[40]，^[41]随后的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运动初期，司氏都选择留守济南，直到1951年，尽管“心中很是留恋”，但他最终还是决定挥别中国。^[42]同年7月，麻风病医院被济南市人民政府接办，12月院址迁往郊区的峨眉山。^[43]至此，该院完成了她的使命，进入全新的历史阶段。

四、尤家骏： 新中国麻风防治工作的奠基者

由齐鲁大学运营济南麻风疗养院的历史虽只有20余年，却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包括医院建筑、麻风救治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该院培养出众多优秀人才，尤家骏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成为1949年后全国麻风防治工作的奠基人、领导者。

尤家骏生于1900年11月8日，1918年入齐鲁大学，1926年从齐大医学院毕业，随后成为大学医院的助理住院医师。1928年秋季学期开始，尤担任医学院皮肤学的教师，并在海贝殖休假期间负责麻风医院的诊治工作。^[44]他深受海氏的赏识，两人合作发表多篇论文。^[45]，^[46]1932-1933年，尤家骏前往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皮肤病院留学，1934年接任齐大医院皮肤科主任，并一直参与麻风病院的治疗工作。1947年他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心医院进修，次年3月代表中国参加于哈瓦那召开的第五次国际麻风病大会，在济南解放前夕回国。可以说尤家骏是当时罕有的兼具丰富工作经验及国际视野的麻风病专家。

除过硬的专业水准外，尤氏很早就意识到根除麻风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他在1930年曾写道：“血气方刚，奋发有为，谋社会幸福，发扬

国光，惟吾青年人是赖焉。一旦患此恶疾，以有用之材，而变为残废之人，对于社会国家，非徒无益，而且加害。麻疯一病，为害于国家经济，社会幸福，亦重且大矣。”^[45]足见其是把麻风问题上升到国家社会发展的高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家骏积极为新政府开展的麻风防治工作建言献策。1950年，齐鲁大学向卫生部提交《关于中国麻风防治简略意见》，详细介绍了国内麻风患者的分布和人数，提出“隔离为主、治疗为辅”的麻风防治方针，以及培训麻风防治人员、建立麻风病院或麻风村隔离收治麻风病人等防治方法。^[47]这份材料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省乃至全国制定麻风防治政策的理论基础。

1951年4月，卫生部召开全国卫生防疫会议，邀请尤家骏参加，详细讨论中国麻风防治措施。同年7月，卫生部委托他开办全国麻风防治高级专修班。1951-1957年，尤家骏于济南先后举办四届高级专修班，为新中国培养出第一、第二代麻风防治领域的专家及医护工作者共计121名。与此同时，他在《中华医学杂志》《中华皮肤科杂志》《大众医学》等刊物上发表二十余篇论文，^[48]并相继出版《麻风病学概论》《新麻风病学简编》等著作。1955-1957年，他连续三年为山东省中级麻风防治训练班授课，共训练中级防治专业人员278名，学员返回工作地后开展初级麻风防治人员的培训，极大充实了山东麻风防治的中基层队伍。^[49]1957年，卫生部发布《全国麻风病防治规划（草案）》，此文件系尤家骏带领20位教授在全国各地调研后拟定的。^[8]毫无疑问，尤氏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麻风病防治事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正是济南麻风病院与齐鲁大学留下的宝贵历史馈赠。

结 论

民国时期的济南麻风疗养院集医疗、科研、教育推广于一身，后两者是同时代中国其他麻风机构所缺乏的。济南麻风病院独树一帜的根本原因系其依托于齐鲁大学医学院，乃当时唯

——一所由大学管理经营的麻风诊疗机构。^{[50],[51]}得益于齐大医学院的雄厚实力,疗养院的医疗与科研均处全国领先地位,甚至在海外享有“中国独一无二的麻风研究机构”的名号。^[52]前后两任院长海贝殖与司美礼的临床理念虽不尽相同,但二者都努力将最前沿的医学观念与中国本土社会相融合,竭尽所能医治患者的病痛;他们也从人道和信仰出发,关心住院患者的灵魂,为其打造全人的生活环境,如此科学系统的救治模式备受时人的赞誉。^[53]

疗养院注重教育培训的特性造就了一批优秀的医学人才,其中尤家骏继承齐鲁大学医学院的优质医疗资源,运用先进的国际视野与丰富的诊疗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麻风防治工作奠定坚实基础,昭示出济南麻风病院和齐鲁大学留下的珍贵知识遗产,同时提醒我们这段历史值得继续深入研究,彰显其应有的价值。

[参考文献]

- [1] 梁其姿. 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J]. 历史研究, 2003, (5): 3-14.
- [2] 胡勇. 传染病与近代上海社会[D]. 浙江: 浙江大学, 2005.
- [3] 刘家峰. 福音、医学与政治: 近代中国的麻风救治[J].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4): 90-99.
- [4] 周东华. 公共领域中的慈善、福音与民族主义——以近代杭州麻风病救治为例[J]. 社会学研究, 2010, 25(3): 114-135.
- [5] 刘影. 福建: 公共卫生与麻风防治(1912-2010)[D]. 福建: 福建师范大学, 2012.
- [6] 梁其姿. 麻风: 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7] 庄辉. 从排斥到救济——基督教信仰与中华麻风救济会的创建[J]. 基督教学术, 2017, (1): 36-58.
- [8] 刘绍华. 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 后帝国实验下的疾病隐喻与防疫历史[M]. 台北: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2019.
- [9] 刘少航. 在政府与教会之间: 云南民国的麻风病防治[J]. 民国研究, 2019, (1): 127-141.
- [10] 中国麻风防治协会. 中国麻风学学科史[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122.
- [11] 郭志坚. 华南及菲列宾游记[J]. 麻疯季刊, 1930, 4(2): 20-26.
- [12] 张士伟. 近代中外合作办慈善: 广东石龙麻风院研究[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16, 32(4): 104-108.
- [13] 刘家峰、叶大深. 聂会东与齐鲁医学教育的发端(1883-1911)[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 204-216.
- [14] 聂会东、尚宝臣. 皮肤证治[M]. 上海: 上海美华书馆, 1898, 129-132.
- [15] Robert, C. *The Chinese, Their Present and Future: Medical, Political, and Social*[M]. Philadelphia and London: F. A. Davis, 1891, 155-168.
- [16] 'Tsinan Leper Hospital (1926-1932)'[Z]. RG011-246-4018,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32.
- [17] 达三. 济南麻疯疗养院筹备中之所闻[J]. 齐大心声, 1924, 1(4): 38.
- [18] 孙吉祥. 济南麻疯疗养院数年来之佳况[J]. 麻疯季刊, 1933, 7(4): 44.
- [19] 中华麻疯救济会消息[N]. 申报, 1927-12-14(16).
- [20] 麻疯会嘉惠病人[N]. 申报, 1930-12-25(16).
- [21] 麻疯会之馈赠[N]. 申报, 1931-12-12(16).
- [22] 麻疯会馈赠全国麻疯院[N]. 申报, 1934-12-25(11).
- [23] Heimburger, L. F. 'The Systematic Treatment of Leprosy'[J].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1931, 45(9): 886-890.
- [24] 郭志坚. 浙苏赣鲁游记[J]. 麻疯季刊, 1929, 3(2/3): 41.
- [25] 中药治疗麻疯获效[N]. 申报, 1929-7-28(16).
- [26] Heimburger, L. F. 'The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of Leprosy'[J]. *The Leper Quarterly*, 1933, 7(3): 37-43.
- [27] 陈伯希. 广东塔头埠南方医院对于治疗麻疯的贡献[J]. 麻疯季刊, 1928, 2(4): 25.
- [28] 麻风之治疗[J]. 齐鲁医刊, 1928, 8(4): 174-177.
- [29] 'Report of the School of Medicine of Cheeloo University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for the Year Ending June 30th'[Z]. RG011-245-4011,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34.
- [30] 'Obituary Notice'[J]. *Leprosy Review*, 1970, 41(3): 191.
- [31] Smyly, H. J. 'Occupational Therapy'[J]. *The Leper Quarterly*, 1940, 14(4): 154-157.
- [32] 'Reports: Tsinan Leper Hospital Report (May 1941)'[J]. *The Leper Quarterly*, 1941, 15(3): 114-120.
- [33] 蒲斯高. 山东第一次麻疯大会记[J]. 麻疯季刊, 1940, 14(2): 22-23.
- [34] 郭志坚. 山东之麻疯[J]. 麻疯季刊, 1940, 14(2): 9.
- [35] 本社编辑室. 短讯一束[J]. 晨光季刊, 1940, 1(4): 7.
- [36] 郭志坚. 铲癩事业在山东——山东第二次全省麻疯大会之召集[J]. 麻疯季刊, 1941, 15(2): 3.
- [37] 中华麻疯救济会山东分会选举新职员[J]. 麻疯季刊, 1941, 15(2): 42.

- [38] 济南麻疯院已被接办 [J]. 麻疯季刊, 1942, 16 (1) : 22.
- [39] 危机四伏之济南麻疯院 [J]. 麻疯季刊, 1943, 17 (2) : 29.
- [40] 'College of Medicine, Tsinan, February 16th' [Z]. RG011-267-4281,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48.
- [41] 麻疯病院董事会改组 [J]. 齐鲁大学校刊, 1947, (62) : 4.
- [42] 沈元津. 忆齐鲁大学英籍教授司美礼 [A],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山东文史集粹·科技卷 [C],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411.
- [43] 关于接办济南麻风疗养院经过情况报告 [Z]. 档案号: A034-00-0320003, 山东省档案馆藏, 1951.
- [44] 'Report of the School of Medicine of the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for the Year Ending June 30th, 1929' [Z]. RG011-245-4010,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29.
- [45] 海贝殖、尤修之. 麻疯病之分布及传染 [J]. 麻疯季刊, 1930, 4 (3) : 17-21.
- [46] Heimbürger, L. F., Yiu, C. C. 'Thallium Acetate as a Depilatory' [J].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1931, 45(8): 742-749.
- [47] 关于中国麻风防治简略意见 [Z]. 档案号: J109-05-0092-045, 山东省档案馆藏, 1950.
- [48] 邓云山. 怀念尤家骏教授 [J]. 中国麻风杂志, 1991, (2) : 111-112.
- [49] 山东省麻风病防治情况综合报告 [Z]. 档案号: A034-02-0148-005, 山东省档案馆藏, 1957.
- [50] 中国麻疯病院及麻疯诊疗所一览表 [J]. 麻疯季刊, 1940, 14 (1) : 7.
- [51] 'The President Situation' [J]. *The Chinese Recorder*, 1940, 71(7): 465-471.
- [52] 'Report of the Medical Director of the Tsinan Leper Hospital' [Z]. RG011-246-4018,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31.
- [53] 中华麻疯疗养院新院所今日开幕 [N]. 申报, 1935-12-14 (12) .

[责任编辑 王大明 柯遵科]